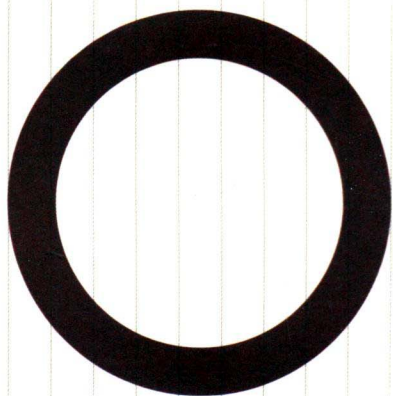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伍江

寄生与共生：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

朱佩禧 著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伍江

寄生与共生：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

朱佩禧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研究的是汪伪政权的金融中枢——中央储备银行。全书在中日持久战的视野下考察该银行的设立、组织、制度等问题,并对该银行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及对汪伪政权的作用,加以深入分析。所用资料丰富翔实,综合运用经济史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反映了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可供历史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供史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寄生与共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朱佩禧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11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伍江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608-4969-0

I. ①寄… II. ①朱… III. ①中央储备银行—研究—民国 IV. ①F832. 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9294 号

寄生与共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

朱佩禧 著

责任编辑 赵泽毓

责任校对 张德胜

装帧设计 孙晓悦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5

印 数 1—1100

字 数 201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969-0

定 价 2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的第二辑和读者见面了。

和第一辑的七本书一样,这一辑也是选题广泛而无专题。作者均来自同济各人文社科院系的教师,显示了近年同济人文社科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希望通过丛书这一形式,向读者展示一个近年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状况和总体水平。当然,和国内各人文社科强校相比,同济的总体差距是明显的,但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同济大学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我们相信,人文社科的发展对于同济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作为一个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可或缺的领域。在当今世界知名一流大学里,即便是传统的以工科见长的大学,加重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也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今人类新知识的产生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而文理交融又是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中最重要的方面。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为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福祉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道德的挑战,工具理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环境理性的质疑。人文精神的更多介入,正是科学技术跨越道德门槛的一把钥匙。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同济大学在中国一流大学的队伍中一直以工科见长,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卓越工程师,为祖国的建设和富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苏式的单科式学科布局也为同济大学向着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局限。为此,同济大学近30年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多学科办学,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和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学科发展,并将此看作同济大学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必由之路。同济历史上曾经是一所理、工、文、法、医都名列国内前茅的大学,各学科相互支撑、相互交融使这所中国最早之一的大学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占据着难以撼动的地位。同济人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自我定位。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同济大学的学科已经覆盖工学、理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哲学、艺术、教育学等10大门类,真

正重新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们坚信，当今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扩充与突破更需要当代科学技术最新知识与最新成果的直接滋润，而当今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也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介入。同济大学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同济大学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然而，历史创伤的愈合需要时间。与超过百年连续办学历史的工科学科相比，同济的人文社科却命运多舛。在经过近半个世纪断裂后的学科接续与重振，即需要勇气（这一点我们已经具备），更需要长期积累与沉淀。厚积才能薄发。同济在这方面已做好准备，但需要时间。同时，同济也需要聚焦。人文社科领域浩瀚无边，后起者更需要选择突破口。作为人类价值观的主要学术载体，今天的人文社科也面临着新的价值观的考验。人类道德已从传统的人际层面、族际层面和国际层面向代际层面延伸。我们的人文社科学科能否担负起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责任？同济准备以此为契机，将之作为同济人文社科学科的突破口。

同济具备很多传统优势，也具备很多新的优势。同济有长期的对德合作和欧洲研究传统，我们在欧洲哲学与欧洲文化研究领域，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在艺术设计领域，都已形成国内领先的学术力量，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和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管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和职业教育学等学科领域也以集聚了相当的学术队伍。厚积仍在继续，薄发指日可待。我们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能够向读者打开一个关于同济人文社科领域的门缝。丛书中各位作者的学术深度必有参差，其中青年学者的作品也难免青涩。但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开端，起点不高却可长久持续。我们更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能够激励起同济人文社科领域的同仁们更高的学术热情，从而付出更多的学术投入，获取更丰富的学术成果。

我们期待同济人文社科丛书越出越多，越出越好。



2012年10月30日于同济绿园

序

朱佩禧博士所著《寄生与共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一书即将出版问世，值得庆贺。这本书是朱佩禧 2009 年获得博士学位时的学位论文，后加反复修改增订而成，是朱佩禧博士数年研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心血的结晶，也是学术界近年对汪伪政权研究的又一有份量的新成果。

近些年，学术界对汪伪政权的研究有较多的成果发表，可说已取得长足进步，但由于长期欠账，对汪伪政权的研究空白依然很多，有待填补的课题仍然不少。即使是如占据汪伪政权金融中枢，也是维持其政权重要基础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这种课题。长期以来，除了某些从抗战时期国统区、沦陷区和汪伪政权地区间进行货币战、日本对沦陷区进行金融统制以及进行金融搜刮等主题的研究成果有所涉及外，对中央储备银行本身，即该银行的设立、组织情况、银行制度、内部经营管理等有关的问题，以及该银行与日本政府、与中外其他银行及对汪伪政权的关系和作用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大多付诸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时也制约了对汪伪政权的全面分析和深入研究。因此可以预料，朱佩禧博士的此书出版，必将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并在推进对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进一步研究，进而推进对汪伪政权的全面研究，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

朱佩禧博士的这本书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该书并非仅仅停留在研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本事，而是站在一个更高和更广的角度，以战时中日经济高度结合的地区——上海为中心的华中¹地区为背景，围绕考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内部组织和业务活动等一系列问题，分析和探讨汪伪政权及其与日本占领军、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

作者认为，日本政府和占领军与汪伪政权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地停

[1] 本书中的华中地区特指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武汉、南京特别市。自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地区分为“伪满洲国”、“蒙疆地区”等沦陷区，抗战区，抗日根据地等地区。随着日军扩大侵略范围，又出现了华北沦陷区，华中沦陷区和华南沦陷区。

留于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汪伪政权也并非与日本利益完全一致而事唯日本是从。在中储行的成立过程中汪伪政权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就是一个例证。侵略者与其扶植的傀儡政府之间的关系，实在有更多复杂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事实上，汪伪政权是为了维持统治，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而积极筹设中储行，可是筹设中央储备银行的过程中，表露出来的日本和汪伪利益的不一致，以及日本政府作为强权的一方在中央储备银行设立和存在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不同作用，能够使读者更明晰地理解“傀儡政府”的内在含义以及历史更为复杂和多层面的一面。理清傀儡政府的历史，有助于加深和拓宽人们对抗战时期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历史的认知水平和视野。

其次，该书全面的分析研究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以及活动的各方面，使读者对该银行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作者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划分为三大阶段：1937年11月—1941年12月7日的“上海孤岛”时期；1941年12月8日以后日军进驻上海时期；1943年4月—1945年9月汪伪政权“控制”时期。作者围绕几个中心问题展开分析：

(1) 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为第一个分析的中心问题。这部分内容主要围绕战时汪伪政权、日本和重庆国民政府在中储行成立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应对策略展开。作者指出，汪伪政权为了维持统治和解决财政危机而积极筹设中储行，日本对于中储行成立“口惠而实不至”，持消极态度，但其后为借助汪伪政权加强对华中资源统制，加上英美等国支援重庆国民政府而使其转变态度，积极扶植中储行。重庆国民政府因为失去东南半壁的财赋重心，不愿意失去上海这个“孤岛”，因而设法维持法币价值，故而力图通过政治威慑来阻碍中储行的成立和营业。

(2) 货币的信用就是政府的政治力。中储行成立后，如何维持中储券的信用和发行量，是作者分析的第二个中心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通过钱庄领券制不断扩大发行数量；通过发行中储券取代法币，抵制和消除蒋介石政权影响；通过成立检查金融事务管理处监管银钱业及成立江浙皖地区的中储行分支行，建立起一整套中央银行制度，并逐步驱逐华中沦陷区流通达到40亿元的法币等方面展开，对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和活动进行了层层推进的研究。

(3) 作为傀儡政权的中央银行，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必然会与其他中外银行发生各种关系，这是作者分析的第三个中心问题。作者分别分析了中央储备银行与华北联合准备银行、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关系以及与上海银钱业的各种关系，探讨了中储行如何确立其“银行之银行”的地位，以及如何逐渐沦为支付日本军费的金融工具的必然命运。作为傀儡政权的银行，中央储备银行避免不了受日本政府控制和沦为日本战争政策工具的命运。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初，日本兴亚院制定《大东亚战争开始后华中通货金融临时处理要纲》，明确提出“储备银行必须尽可能早日成为我方筹措军费及其他必需资金的银行”，要求“进一步加强我方对该行的控制，同时使该行的经营得以全面配合我方的政策”。除加强对该行的顾问制度派遣人员外，还通过借贷的方式对该行加强控制。7月，应日本政府要求，日本银行向中央储备银行放贷一亿日元，8月订立借贷四亿日元的契约，中储行的金银和外汇都被要求存入日本银行，并在日本银行和中储行间建立“互存”往来，以利于日本获得新通货。11月，7家日本银行与中储行订立往来透支契约，且无透支限额，也无抵押条件，不仅使中储行成为日本军费需求的提款机，还造成中储行通货出现“爆炸性的猛增”。本书通过对这些史实的叙述和分析，对中储行的本质和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作出了有力的论证。

(4) 作为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中储行设立后，财政上与汪伪政权和日本在其背后的制约等关系，是必然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是作者分析的又一个中心问题。作者从分析中储行经营国库、汪伪政府向日本借款以及与日本银行签订透支契约等方面入手，考察日汪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日本通过加强中储行顾问权力来增强对中储行的操纵，进一步论证了汪伪政权的“傀儡”性及其表现形式。

第三，现代战争是总体战争，而非单纯的军事战争。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可能爆发“不见硝烟的战争”。其中经济战又是总体战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作者从这个理念出发，重点分析了抗战时期日本、重庆和汪伪政权间的经济战。经济战因中储行的成立和中储券的发行使得抗战时期的经济战变得更为激烈。本书通过对中储行的设立和中储券发行的研

究，能够使读者更深刻的体会到现代战争立体性的一面。

从资料的角度看，本书的主体资料主要利用了日本报纸中有关中储行和货币战的报道、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日本外交文书以及上海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辅以其他有关的出版物、报纸杂志和有关文献。除了能够论证该书所提问题以外，还给读者提供了不少资料和有关文献的线索。

当然，因为种种原因，本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本书主要分析的对象是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对中央储备银行在各地分支行的情况进行更详细和系统的研究。如果能够对这部分内容扩展研究，一定能够使得本书会更加丰满和深入。

其次，本书在讨论过程中涉及日本政府与中储行的多种关系，有些部分感觉还流于简单，例如日本顾问对中储行的干预和控制，还缺乏更加具体和典型的分析。对于日本政府把中储行当做军费“提款机”，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感觉还可以更加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同时，在日本政府如此控制下中储行的反应，本书的分析感觉过于简单，未能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矛盾斗争的更深层的关系。

总之，朱佩禧博士这本书的出版，使得近年对汪伪政权的研究更加丰富。与此同时，我们希望朱佩禧博士能够在现有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为汪伪政权和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朱荫贵
复旦大学历史系

前言

汪伪政权在1941年1月6日成立“中央银行”，沿用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央储备银行法案”，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简称中储行，其发行货币以下简称中储券）。

本书主要利用日本报纸中有关中储行和货币战的报道、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日本外交文书以及上海市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等馆藏档案资料，研究中储行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四年多的运行过程中，通过钱庄的领券制不断扩大发行数量，通过发行中储券取代法币，消除蒋介石政府的金融影响，通过成立检查金融事务管理处监管银钱业及成立江浙皖地区的中储行分支行，建立一整套中央银行制度。本书围绕汪伪政权与日本政府在金融上合作与折冲的关系展开论述，考察中储行成立的背景、中储行的组织和制度建设、中储券发行所引发的货币战以及日本逐渐加强对中储行的控制，从而研究日本政府在金融领域对沦陷区的控制和掠夺程度。另外，通过分析汪伪政权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的优劣得失来研究汪伪政权如何获取维持统治权威的金融力量，探究在战时国家和社会时空的情境下汪伪政权的具体作用与内在含义。

由于日本的军事侵略，中国被分割成重庆国民政府控制的国统区，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和汪伪政权控制的华中沦陷区¹，以及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台湾、华北等占领地，在各分裂区域中出现了相对或暂时独立存在的政权形式，而如何理解占领者日本、抵抗者重庆国民政府和妥协者汪伪政权这三者的关系乃是一个仍值得全面深入探究的课题。本书选择以汪伪中储行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日经济高度结合的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汪伪中储行的业务组织和其系列活动，考察中日战时背景下的汪伪傀儡政权及其与日本占领军、重庆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从而

[1] 华中沦陷区，主要是上海、南京和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二市，后来随着日军占领武汉、长沙，又增加了湖南和湖北两省的部分地区。

更明晰地理解“傀儡政府”的内在含义。理清傀儡政府的历史，描述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社会经济史的实态有助于提高和拓宽人们对抗战时期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历史的认知水平和视野。

日本与汪伪政权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汪伪政权在中储行成立过程中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十分突出的。入侵者与其扶植的傀儡政府之间的关系，实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汪伪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确立政治权威，积极筹设中储行，可是筹设过程日本和汪伪利益的不一致，使中储行成立经历了不可避免的曲折过程。

在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是当时中国工商业和金融的中枢，也是国内外金融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区。中储的成立，成为引发日本、汪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三方货币战的导火索。可见对于傀儡政权来说，成立属于自己的“中央银行”实属难上加难，这种机构的成立不仅遭到原有势力的反对，而且还有殖民者的干预。

一方面，中储券和法币经过等价兑换、差价兑换和全面回收三个阶段，法币被驱逐出沦陷区，而日本用回收的法币到国统区购买物资使重庆国民政府财政崩溃；另一方面，通货信用和政治威信相挂钩，中储券成为华中地区通货，为了维持中储券价值，日本开始加强对汪伪政权的扶植和控制，特别是日本派经济顾问加强对中储行的干预力度。1943年4月日本政府停止发行新军票，中储券回收军票，进而中储券军票化，发行日益膨胀。日本利用中储券使中储行为日军费“埋单”。汪伪政权因而绑在日本对外扩张的“战车”上而增强了傀儡性。本书通过中储行这一伪政府金融机构的个案分析和探讨战时复杂的中日关系，从而加深人们对抗战时期沦陷区历史的理解。

目 录

总 序 序 前 言

第一章 导 论	(1)
一、相关研究现状	(2)
二、研究范围的界定	(7)
三、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9)
四、研究的创新和局限	(10)
第二章 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前后各方的矛盾和斗争	(12)
第一节 汪伪政权提出设立中央银行的诉求	(12)
一、汪伪政权正统性的诉求	(13)
二、汪伪政权的财政窘境	(16)
第二节 日本对中储行成立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20)
一、华兴商业银行	(21)
二、军票	(25)
三、关余	(28)
第三节 重庆国民政府的抵制策略	(33)
一、法币平准基金会	(33)
二、舆论宣传	(40)
三、恐怖暴力	(42)
小结	(44)
第三章 汪伪极力保证和维持中储券信用	(45)
第一节 中储行的成立	(45)
第二节 推行中储券	(50)
一、等价兑换:1941 年 1 月 6 日—12 月 7 日	(50)

二、平定恐慌:1941年12月—1942年3月	(62)
三、差价兑换:1942年3月—5月	(70)
四、全面回收:1942年5月4日以后强行收兑法币的过程	(75)
第三节 拓展行务	(80)
一、上海分行	(80)
二、管辖行制度	(85)
三、中央信托公司和中央储蓄会	(88)
四、粮食和棉花的抵押放款业务	(92)
第四节 处理券务	(98)
一、废券	(98)
二、假币	(100)
三、破损券	(106)
四、回收军票	(108)
小结	(109)
第四章 中储行与各中外银行间的往来关系	(111)
第一节 与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关系	(111)
一、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成立	(111)
二、中储行与联银的关系	(113)
三、中储券与联银券的兑换	(114)
四、中储券与联银券之间兑换率的变动	(116)
第二节 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关系	(117)
一、“互存”之由来	(119)
二、“互存”之实质	(122)
三、影响:华中沦陷区超级通货膨胀	(127)
第三节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复业	(131)
一、中、交两行的历史沿革	(132)
二、中、交两行的改组过程	(133)
三、复业后与中央储备银行的关系	(138)
四、复业后经营状况	(141)
第四节 监管银钱业,确立“中央银行”的地位	(143)

一、银钱业为游资投机推波助澜	(143)
二、中储行设立检查金融事务处	(144)
三、整肃银钱业	(146)
小结	(151)
第五章 中储行与汪伪财政的关系	(153)
第一节 中储行经营国库	(153)
第二节 借款契约和透支契约	(157)
一、周佛海和日本签订借款契约	(157)
二、日本向中储行透支	(159)
第三节 中储行日本顾问制度	(160)
结 语	(164)
一、货币战与傀儡政权威信的建立	(164)
二、战时状态下经济对政治渗透	(166)
三、日本控制与汪伪的合作	(166)
四、合作下的矛盾	(168)
附 录	(169)
I 中央储备银行同人录(1944 年)	(169)
II 1937—1944 年中国通货发行统计表	(170)
III 与中央储备银行相关的法令法规	(171)
IV 中央储备银行大事记	(197)
参考文献	(214)
一、原始档案	(214)
二、报纸杂志	(217)
三、出版史料	(218)
四、专著	(219)
后 记	(223)

图表目录

表 2-1	1936—1940 年华中华南沦陷区各关历年税收统计	(30)
表 2-2	抗战以来法币发行量与通货准备金统计表	(37)
表 3-1	1940 年 7 月至 1942 年 12 月中央储备银行定制兑换券 数量表	(46)
表 3-2	中储行各局局长和处长人事名单	(48)
表 3-3	A 阶段各类商品与使用通货比例	(54)
表 3-4	B 阶段各类商品与使用通货比例	(55)
表 3-5	C 阶段各类商品与使用通货比例	(56)
表 3-6	银行和钱庄领用暗记券规定	(59)
表 3-7	1941 年中储行发行额与他行领用额按月统计表 ...	(61)
表 3-8	1941 年 12 月—1942 年 2 月广东省银行存款动 态	(65)
表 3-9	1941 年 12 月—1942 年 2 月广东省银行每日兑现 状况	(67)
表 3-10	中储券 1941 年 7 月至 1942 年 5 月的发行额	(71)
表 3-11	中储券挂牌行市变化	(74)
表 3-12	1941 年度总分支行发行兑换券和辅币券一览表 ...	(82)
表 3-13	1943 年上海食物、衣料等平均市价指数表(民国三十一年 六月指数为 100)	(90)
表 3-14	汉口发现假币状况表	(103)
表 3-15	1943 年由发行局、甬、杭等处运来破损钞券到 沪库表	(107)
表 4-1	1942 年 10 月到 1943 年 1 月正金银行拨付日军票平衡基金 的明细表	(123)
表 4-2	正金银行调拨中储券的情况表	(126)
表 4-3	储备券增发与往来存款使用国库金支出比较表	(126)
表 4-4	上海市中国工人生活费指数	(130)

表 5-1	国库存款和中储行负债总额比较表(1941 年 1 月 10 日— 1945 年 2 月 10 日)	(154)
表 5-2	伪中央储备银行日本顾问及顾问附暨顾问辅佐一 览表	(161)
图 3-1	中储行的组织机构	(47)
图 3-2	上海货币流通阶段图	(54)

第一章 导 论

近代以来,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枢。进入 20 世纪后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止,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飞速发展,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各大金融机构将总行设于上海。可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断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因为日军占领,金融市场几度出现“挤兑风潮”。日本政府为掠夺经济资源,更是扶植成立了一批傀儡政府,其中 1940 年 3 月成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可谓后来者居上,成为众傀儡政府中的“佼佼者”。

有关汪精卫傀儡政府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站在重庆国民政府或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立场批判其非正统性和虚伪性,对其政治、军事方面关注较多,而忽视了傀儡政权经济、社会层面的研究。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沦陷区社会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多,这将加深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而使抗战史更丰满更立体。其中,对于汪精卫傀儡政府成立的“中央银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中储券与货币战,认为中储行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金融工具,符合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本书希望跳出先入为主的立场,拓宽研究界限,通过研究中储行对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政权、政财以及沦陷区金融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中央银行在傀儡政府中所起的作用。所谓“经济实力是支持政权的基础”¹,八年的中日战争实质是经济和军事的总力战,因此傀儡政府为了维持沦陷区秩序,与重庆国民政府展开财政与经济斗争、与日本政府也不断有折冲和妥协。日本为了获取军事和政治上所需要的物资和财政给养,也给傀儡政府相应的权力。

“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有着密切关系。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和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于 1928 年设立中央银行。而 1929 年世界经济萧条爆发和 1934 年美国颁布收购白银法案,造成白银价格的上升,均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的契机,将白银收归国有,发行纸币。纸币被百姓所信任和使用,实际上在于它背

[1]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26),1996 年,第 27 页。